

# 中国历史文献学

顾 问 张大可 徐景重

彭久松

主 编 谢玉杰 王继光

副主编 田国梁 何兆吉

李家发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王炜民 王春淑

吕幼樵 孙益力

朱渊青 李晓菊

李绍平 李 泉

余敏辉 张海英

林宏跃 杨绪敏

周 洪 徐兴海

徐家骥 阎崇东

郭书兰 彭忠德

民族出版社

## 前 言

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是八十年代以来在部分高等院校历史系新开的一门课程。从学科体系上来看，这既是一门传统的学问，历史悠久，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具有系统理论的“中国历史文献学”，还处在建设阶段。本书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所涵盖的内容及体系和体例，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创造，既继承传统，而又打破传统，是一部建构中国历史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尝试。

文献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，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。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从商代甲骨文算起，中国历史文献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。中国传统的文献工作，从孔子整理《六经》算起，已有两千四、五百年的历史。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在文献工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并建立和发展了广义文献学的许多分支学科，如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考据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注疏学等等，都可冠以文献二字，称之为“文献目录学”、“文献版本学”、“文献校勘学”等名称。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欣夫《文献学讲义》就是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大块。上述各门文献分支学科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它们是伴随着我国古代大规模图书整理和群经、群籍的注疏而发展起来的。各门学科都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和方法，并有丰硕的成果，涌现了众多的专门文献学家。所以说，中国文献学，或中国历史文献学，是一门传统的学科，它是中国悠久文化、悠久历史的产物。学术的发展是不断的深入和分支，同时也要求有不断的综合概括。中国广义文献学，由校雠工作而发展演化出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考据学、辨伪学；又由

经学讲习传授而演化出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注疏学等等，这就是学术的深入和分支。学术越分越细，越密越专。但是，在实际运用中，又需要综合的知识。如何批判继承和整理利用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就需要综合的文献学知识。具有系统理论的综合型的中国历史文献学，并不等于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大块或四大块、五大块的拚合物。它应该具有独特的系统的理论和体系，它的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、研究成果、发展历史，应该作系统的总结。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郑鹤声、郑鹤春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，才正式提出了专书“文献学”的名称，把建立“文献学”理论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。但自那以后，历史过了半个世纪，系统的文献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。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张舜徽的《中国文献学》，被称为“奠基性”的著作。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吴枫的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同样具有开创的性质。与此同时，学术界出版了《中国文学文献学》、《档案文献学》等专科文献学。综合型或专科型的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，现在已有多种出版。“文献学”领域出现的这种“百家争鸣”景象，又说明了它具有青春的活力，正处在发育、成长的阶段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结构，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定式。

按照我们的构想，“中国历史文献学”这一传统学科，把它列入教学体系，应该是“中国历史文选”的发展，其目的是扩展学员更进一步了解和使用中国历史文献的能力，为从事历史学研究或古籍整理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因此，编写适用于教学的“中国历史文献学”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。本书编写的学术方针是：第一，尽可能做到在有限的篇幅内，知识覆盖面要宽；第二，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出新体例；第三，要反映时代的信息，给学员以最新思想和实用的知识。本书编写的组织方针是：贯彻多所高等院校的横向联合，集思广益，以便在出版发行后具有较宽的教学实验基础，不断完

善。作为教材要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。基于这一认识，这次编写，我们以1991年陕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25院校本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作为基础，进行修订改编。这次协作的共有23所高校，有原有的作者，有新增作者。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谢玉杰院长、西北民族学院王继光教授任主编，由原25院校本《中国历史文献学》主编张大可教授和副主编徐景重、彭久松两先生为顾问，与主编共同组成编委会工作。田国梁、何兆吉、李家发三先生为副主编协助编委会工作。参加作者均为编委，共同对编委会提出的修订大纲进行审读、删改、补缺，提供教学实践的经验 and 意见，撰写自己最有创见的篇章段落，供编委会采择。最后由顾问张大可教授审核定稿。这种协作形式更有利于集思广益，并在原有的基础上一步步前进，这也是本书的成功尝试。

本书作者列名（括注单位）如次：顾问张大可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）、徐景重（重庆师院）、彭久松（四川师大）；主编谢玉杰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）、王继光（西北民族学院）；副主编田国梁（西北民族学院）、何兆吉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）、李家发（重庆教育学院）；编委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王炜民（内蒙古包头师专）、王春淑（四川师大）、吕幼樵（贵州师大）、孙益力（山西大学）、朱渊青（上海师大）、李晓菊（人民大学）、李绍平（湖南师大）、李泉（聊城师院）、余敏辉（淮北 炭师院）、张海英（华东师大）、林宏跃（山西师大）、杨绪敏（徐州师大）、周洪（江西师大）、徐兴海（陕西师大）、徐家骥（陕西咸阳师专）、闫崇东（内蒙古师大）、郭书兰（郑州大学）、彭忠德（湖北大学）。

编委会  
1999年6月

# 目 录

## 导论：历史文献学的范围、任务与相关学科

- 一、文献与历史文献..... (1)
- 二、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..... (7)
- 三、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..... (11)
- 四、历史文献学的地位与相关学科..... (12)

## 第一章 载体类别文献

- 一、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..... (20)
  - 甲骨文献..... (21)
  - 金石文献..... (25)
  - 简牍文献..... (31)
  - 缣帛文献..... (39)
  - 抄本文献..... (42)
- 二、雕版印刷文献..... (47)
- 三、活字印刷文献..... (63)
- 四、现代技术载体文献..... (66)
  - 音像文献..... (67)
  - 缩微文献..... (68)
  - 机读文献..... (69)

## 第二章 典籍类别文献

- 一、四部典籍文献..... ( 71 )
  - 经部典籍文献..... ( 72 )
  - 史部典籍文献..... ( 76 )
  - 子部典籍文献..... ( 83 )
  - 集部典集文献..... ( 88 )
- 二、类书、丛书..... ( 91 )
- 三、佛藏、道藏..... ( 97 )
- 四、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..... ( 102 )
- 五、古籍的现存概况..... ( 109 )

## 第三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（上）

- 一、编年体与纲目体文献..... ( 111 )
  - 编年体文献..... ( 111 )
  - 纲目体文献..... ( 123 )
- 二、纪传体文献..... ( 124 )
- 三、纪事本末体文献..... ( 141 )

## 第四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（下）

- 四、典志体政书文献..... ( 149 )
- 五、别史、杂史文献..... ( 160 )
- 六、地理、方志文献..... ( 172 )
- 七、传记、学案、笔记文献..... ( 185 )
- 八、史论、史评、史考文献..... ( 195 )
- 九、近现代新型史学论著文献..... ( 210 )
- 十、考古与文物研究文献..... ( 219 )

<b>第五章</b>	<b>古今原始资料文献</b>	
一、	起居注与实录 .....	( 226 )
二、	诏令奏议 .....	( 229 )
三、	古文书 .....	( 231 )
	敦煌文书 .....	( 231 )
	吐鲁蕃文书 .....	( 234 )
四、	档案 .....	( 235 )
五、	调查报告 .....	( 241 )
六、	现当代传记、回忆录 .....	( 242 )
七、	文史资料 .....	( 244 )
八、	年鉴、手册 .....	( 246 )
九、	报刊资料与文摘 .....	( 248 )
十、	统计 .....	( 254 )
<b>第六章</b>	<b>整理历史文献的基础知识</b>	
一、	目录 .....	( 259 )
二、	版本 .....	( 272 )
三、	校勘 .....	( 285 )
<b>第七章</b>	<b>历史文献的实证</b>	
一、	考据 .....	( 292 )
二、	辨伪 .....	( 299 )
三、	辑佚 .....	( 307 )
<b>第八章</b>	<b>历史文献的注释</b>	
一、	断句 .....	( 315 )
二、	音韵 .....	( 320 )
三、	训诂 .....	( 326 )

四、注疏.....	( 332 )
-----------	---------

## 第九章 当代的古籍整理

一、新式点校.....	( 346 )
二、今注、今译.....	( 351 )
三、通用的古籍整理.....	( 359 )
断句影印.....	( 359 )
整理选本与全集.....	( 359 )
资料汇编.....	( 362 )
四、编制书目索引.....	( 367 )

## 第十章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与成就

一、历史文献学的产生——先秦时期.....	( 369 )
二、历史文献学的形成——两汉时期.....	( 381 )
三、历史文献学的发展——魏晋至宋元.....	( 393 )
四、古典历史文献学的高峰——明清时期.....	( 406 )
五、近现代的文献工作与文献学——“五四” 以来的新时期.....	( 421 )

导 论：

## 历史文献学的范围、任务与相关学科

什么是文献？什么是文献学？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界说是什么？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和任务是什么？与文献相关的学科有哪些？“导论”作集中的探讨与概说。

### 一、文献与历史文献

【文献】文献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，它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全部历史和经验，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。因此，“文献”一词的涵义在不断地扩大。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，如果从商周时代甲骨文、金文算起，中国历史文献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。今天种类繁多的文献，与甲骨文、金文相较，真是天差地别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中国古代的“文献”概念，当然不能适用于发展了的今天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现代文献

学，首先必须对“文献”一词作出新的定义。

目前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含义，说法不一。《文献》杂志1985年第4期，开辟了讨论专栏，展开了讨论。该刊编辑部在《致读者》一文中指出，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解释，代表性的意见为两种：“一种是把‘文献’看做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名词性词组，文指文章，献指贤人；另一种认为文献是指图籍和文物。”该刊同期发表邵胜定《说文献》一文，对两种解说都不赞同，他认为文献即上献的书籍文章，不应包括文物。《文献》1986年第1期刊载傅振伦的《释文献》与单柳溪的《文献诠释》两文，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傅文说：“文献学就是图书资料之学，包括口碑，往事的追记回忆，不见经传的古迹古物的再现、勘查，以及现在时事和人类、民俗调查等等资料在内。换言之，文献学也就是目录学。”单文则认为：“具有使用价值、历史价值的字、词、语、篇、书、人、时、事、地、物具体材料的科学、典型、完备知识的资料，就是文献。”学术界还有其他种种说法，兹不具引。

本书对“文献”的涵盖，定义如下：

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、图物资料、音像资料等等，均为文献。

在这个定义中，一切图书、期刊、报纸、图画、谱表、有历史价值的符号、文物，以及各种视听资料，如胶片、胶卷、录音带、录象带、幻灯片、影片、磁带等，它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，只不过是形式与载体不同而已，都应当是文献。我们认为这是广义的、全面的“文献”含义。

“文献”二字连用，最早出自孔子的言论，记载于《论语·八佾》篇中。孔子说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汉、宋大

儒郑玄、朱熹等以典籍释文，以贤人释献。

这个解释就是孔子所说“文献”的本义。“文献”是一个联合词组，“文”与“献”两字有不同的含义，而又为孔子所连用取证，使得古代学者都把传说口碑、名人言议与书本记载并重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宋末元初马端临以“文献”二字名其书，曰《文献通考》，并在该书《总序》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。马端临说：“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，而参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有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文也。凡论事，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，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谓献也。”马氏的《文献通考》，不是通考“文献”的文献学，而是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。他之所以认真地辨析“文”与“献”，旨在说明《文献通考》的取材，主要有两个来源，一是叙事的图书资料，二是论事的名流言议，并在行文中加以区别。凡是顶格写的，都是书本记载；凡是低一格写的，都是名流言议。马氏用叙事与论事来区分“文”与“献”，已经改变了孔子所释“文献”的本义，缩小了“文献”的内涵，只限于文字记载的图书、典籍、资料，可以视为一种马氏一家之言的狭义的文献解释。

随着科学技术文化的不断发展，特别是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入，“文献”的旧概念已不完全。所以在实际运用中“文献”的概念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。在当今的图书、情报工作中，“文献”已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。

国家标准局公布的文献定义为：“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。”按此定义，文献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图书，而且包括档案馆、博物馆、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。在国际上，例如美国，已直接将文献改为“情报”。文献是一切情报的载体，而情报则是一切文献的内容。有人认为情报是动态

的、活的，有较强的针对性，它不局限于文字，也不局限于以往和现时的材料，还能预测将来，有反馈作用。这些特点，与用文字记载的静止的图书资料，迥然有别，情报就是文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（参阅洪湛候：《中国文献学新编》）。当然文献不能与情报划等号，两者有别，但两者广义相通。现代广义文献，其内涵，应当是与情报科学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。文献含义的不断演变与扩大是历史的必然。

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，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“文献”，认为它是一个旧名词，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。我们认为，即使“文献”的原本意义，也要重新予以科学的定义或说明。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文献，不论其形成途径、制作方式或出版与否，关键在于有一定的载体作为依托而成为确定的可感知的对象。古人界定“文”与“献”的区别，目的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。献者，贤也，指的是言议的载体。而作为言议载体的硕学耆儒本身并不是图书，但他们的言谈议论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，转化成图书。例如《论语》这部图书，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，它既是“文”，亦是“献”。进一步说，图书本身也只不过是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。同理可证，地下出土的骨骼化石或没有文字的各类文化遗存，本身并不是文字资料，但它蕴藏的历史价值可以通过古生物学家、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、诠释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。说得确切一些，文物是考古学家的文献；文物考古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是历史学家的文献。把文物排除在文献之外，是没有道理的。有文字记录的文物，如甲骨、金石，本身就是文献，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遗物，通过文物考古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。而图书典籍本身也是文物，即图籍文化遗物。当然这都是广义上的二者相通。就狭义而言，“文献”一词古老，是单音联合词组，“文”指典籍，“献”指贤者；“文物”是近晚的编正双音词，文化遗物为基本义。学科定义，文献

学与文物考古学，范围、目的迥殊，不容混淆。文献学的着眼点是文献整理，文物考古学的着眼点是文物的价值鉴定与阐释。凡学科定义的术语均是狭义的。广义是开阔思路，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、重叠与相通，狭义才是研究的范围。学术界对“文献”释义的众说纷纭，一是墨守成规与演变发展的冲突，二是广狭二义混淆的冲突。这些都要用辩正的思维来整理。

综上所述，全面的“文献”定义，‘文’指知识记录的符号，包括文字、图画、符号、音像等，‘献’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，包括图书、贤者、文物、胶片、胶卷、录音带、录象带、影片、磁带、电脑装置等。换句话说，“文”和“献”都在发展。“文献”二字，分开来看，它是一个联合词组；合起来看，不应当加以分割。本书重新界定的“文献”含义，简言之，就是“人类知识记录”，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（即文），并附在一定的载体（即献）上可以被感知。“文”与“献”是不能分割的。对“文献”一词的含义作这样扩大和革新的界定，目的是扩大文献学的视野，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，即突破“古籍文献”的藩篱，包容当代的科技文明。可以预料，未来的科技发展，还会出现我们预想不到的知识记录形式和载体，但它都将统一在“人类知识记录”这一界定的含义中。但迄今为止，有文字记录的图书仍是文献的主体，而且是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，因此，“文献”一词的原有意义不能割断，尤其是在传统的古典文献学的用语中，更是只有原本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“文献”一词，可以有广狭二义。广义文献，就是由一定载体所表现的全部人类知识记录；狭义文献，就是原本的含义，专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。

**【历史文献】**何为历史文献？亦有广狭二义，可作如下界定：

广义历史文献，系指一切文献；狭义历史文献即历史学科史料文献，其中历史学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

义历史文献的主体。

历史，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。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历史知识的记录。因为时间是一付无首无尾、连绵不断的链条，它以“现在”为座标，前乎此者谓之“过去”，后乎此者谓之“将来”。过去即历史，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；现在即当今，产生的文献叫当代文献。而“现在”，在时间链条中，是一个极不稳定、稍纵即逝的环节。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，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。所以本书使用的“历史文献”的时间概念。只从属于“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”的命题，在收罗文献时，尽可能下延至现在，从古代至建国以来的四十年，均在论述之列。

其次，从学科体系来看，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发展过程，十分广泛。广义的历史文献，可以包容天地间一切著作，一切文献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，专指人类社会史，即所谓狭义历史学。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四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，以及现代文、史、哲、经等分类中的史学著作。任何目录分类，都是相对的。因此，史部以外各部中实多含史学文献，古今学者早有论说。章学诚《报孙渊如书》称：“承询《史籍考》事，取多用宏，包经而兼子集，不特如所询地理之类已也。”可见章氏所著《史籍考》，已不限于四部分类的史部典籍。章氏又有“六经皆史”的论题，这是指《六经》皆为史料。早在两千年前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就以《六经》为史料。他提出了“厥协《六经》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”的命题，广泛取材。但是，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，则是广义历史文献，它与一切文献没有区别，而失之于混淆；如果固守史部类目，必又失之于偏狭。“混而合之则不清，拘而守之则已隘”（章学诚：《史考释例》），即所谓“过犹不及”，太广太狭都是弊病。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，以狭义的史部典籍为主体，而概述广义的四部文献，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，主次分明，取

中用宏。这就是本书定义历史文献的理论基础。

## 二、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

【文献学】 泛言之，以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对象的学科，就是文献学。在中国文化史上，“文献”一词产生很早，已如前述，而“文献学”一词则产生很晚，定义迥殊，是近代才出现的。梁启超将广义历史学解释为“文献学”，见于1942年成书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梁氏说：“广义的史学，即文献学。”显然，梁氏的定义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献之学。第一部以“文献学”命名的论著，并对“文献学”一词作定义界说的是郑鹤声、郑鹤春。二郑编撰的《中国文献学概要》，成书于1928年，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书在《例言》中援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关于“文献”的释义后说：

本编亦采其谊，结集、翻译、编纂诸端，谓之文；审订、讲习、印刻诸端谓之献。叙而述之，故曰文献学。

这部“文献学”是以孔子之言与马端临所释的“文献”含义来规范“文献学”，内容结构一是叙述图书文献的结集编纂演变历史，二是讲述审订、传播文献的基本方法。二郑氏的开创之作，把建立“文献学”理论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。但自那以后，历史过了半个世纪，系统的文献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。故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张舜徽的《中国文献学》，被称为“奠基性”的著作。该书对“文献学”的界说具体地作了如下表述：

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、资料（包括甲骨、金石、竹简、帛书），进行整理、编纂、注释工作。

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、系统化；古奥的文字通俗化、明朗化。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条别源流，甄论得失，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、节省时间，在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方面，作出有益的贡献，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。

张舜徽先生对“文献学”的这一定义，实即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献工作的概括，古称校雠学，现今一般称为传统文献学，或古典文献学。中国传统的文献工作，从孔子整理《六经》算起，已有二千四、五百年的历史。中国古代的文献学家在文献工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并建立和发展了广义文献的许多分支学科。这些分支学科是：一是由校雠工作而发展演化出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考据学、辨伪学；二是由经学讲习传授而演化出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注疏学等等。上述各门文献分支学科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它们是伴随着我国古代大规模图书整理和群经、群籍的注疏而发展起来的。所以说，中国文献学是一门传统的学科，它是中国悠久文化历史的产物。学术的发展是不断的深入和分支，同时也要求有不断的综合。在今天，如何批判继承和整理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，以及如何分类整理利用内容繁多的现代文献，这就需要有综合型的系统理论的文献学作指导。具有系统理论的综合型的文献学，并不等于目录、版本、校勘三大块或四大块、五大块的拚合物，它应该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，它的研究对象、研究方法、研究成果、发展历史，应该作系统的总结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目前还不健全，在学科结构上尚未形成定式。

正由于文献学及其系统理论的归纳总结是近现代提出的，所以张舜徽在《中国文献学》中说，我国古代，“无所谓文献学，而有从事于研究、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”，即有文献工作而无文献学。此话失之于含混。我们认为有文献工作，就有文献学。所

谓“学”，即“理论”，就是对实践工作及其历史过程所获经验的总结与升华。由古代各项具体文献工作所形成的目录、版本、校勘等等具体学科，皆以文献为对象，故均可加“文献”二字，而名之曰“文献目录学”、“文献版本学”、“文献校勘学”等等。这些文献分支学科的总和就是广义文献学。从宏观上，对古代文献工作的方法和经验，加以总结和概述，使之理论化、系统化，是近现代提出的任务，可称之为狭义的综合文献学，简称文献学。古人没有对文献工作从宏观上作系统的理论归纳，不等于没有文献学。有文献工作，就是文献学。

既然“文献学”的理论归纳是近现代提出的任务，尤其是当代人的任务，因此文献学的理论不能停留在古代的传统工作范围之内。现代文献学理论必须包括古今的文献工作。古代传统文献工作的重点是对图书的分类和整理。现代文献工作，除对图书的分类整理之外，还着重对文献的技术处理，以便达到最迅速的传播和利用，亦即文献的检索。袁翰青同志给现代文献工作归纳了如下的一个定义，即：

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。更明确一点可以说，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，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，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取之后，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，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，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。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质上就是所含的情报。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有两个方面：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。只有经过科学地组织起来，检索工作才有基础。组织工作是体，检索工作是用。这体和用的两方面，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。（《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》，载《图书馆》1964年第2期）